

论红帮在中国近代服饰转型时期的引领作用

刘云华

摘 要: 红帮在中国近代服饰转型时期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他们率先引进西服缝制技术,并一直保持与西方时尚潮流的同步性,引领了国内服饰潮流的新趋势;他们根据中国人的生理特点和心理需求,改良西服缝制技术,创“海派”西服,并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服饰款式——中山装,改良旗袍,有力推动了中国传统服饰的转型。红帮裁缝作为服饰新潮流的引领者,对中国近代服饰的转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 红帮裁缝; 中国近代服饰; 中山装; 旗袍

中图分类号: TS94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346 (2008) 03-0047-04

1840年以降,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中华民族的传统藩篱被“欧风美雨”的暴力不断摧毁,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急速渗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服饰也伴随着中西参半的思想意识和辛亥革命后国家政体变化的影响而进入转型期。在中国近代社会经历的这场“莽莽欧风卷亚雨”中,一批批先进中国人为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一直探求向西方国家学习真理的道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从“器物、制度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种豆得瓜”,开启了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客观上对先进人士穿着西装创造了一定的便利条件;戊戌变法“剪辫”、“易服”的倡导对传统服饰的转型起到一定催化作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赋予人们穿着西服的选择权;新文化运动打开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枷锁,使拥有服饰选择权的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文化,摒弃传统服饰。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先进人士的呐喊固然无时不敲打着传统服饰观念这块僵土,催化传统服饰的转型。

面对“欧风美雨”席卷下一个纷繁多变的世界,面对历史所赋予的前所未有多种抉择的可能,宁波本帮裁缝凭借与生俱来把握商机的敏感,弃旧从新,率先涉足西服业,而后迅速占领中国西服市场,成功转型为以缝制西服见长并具备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的新型裁缝——红帮裁缝。正是红帮裁缝将先进中国人力倡的传统服饰革新观念转化为了现实,实现了传统服饰的快速转型。在此过程中,红帮裁缝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一、红帮裁缝率先引进西服缝制技术,并一直保持与西方时尚潮流的同步性,引领了国内服饰潮流的新趋势

近代中国大门被打开不久,大部分中国人还未意识到西方新鲜事物的涌入将会为传统行业带来新机遇时,一批来自宁波的本帮裁缝已经发现了西服所带来的新商机。根据《上海轩轾殿成衣公所》记载,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来自宁波六邑缝制洋服的“洋帮裁缝”,就建立了类似封建行会组织的“北长

收稿日期: 2008-06-03

作者简介: 刘云华,女,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博士,主要研究红帮服装文化(浙江宁波315211)

生”关帝圣王殿。^①“洋帮裁缝”就是组成今后“红帮裁缝”群体的主要构成人员,他们率先掌握了西服的缝制方法,成为最先探索出西服立体造型方法奥妙的中国裁缝。自此,西服业开始在中国萌芽。当时他们还没有固定店铺,而是通过走街串巷的“拎包”式谋生方式,为中国买办阶层、归国留学生等较早接受西方服饰文化的群体缝制洋服。这些在中国较早抛弃传统服饰、接受西方服饰文化的“先锋”群体的穿着行为,对其他中国人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成为中国传统服饰转型的先声。

20世纪初期,“洋帮裁缝”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拥有了固定的店铺后,他们通过进口最新面料、订购时尚流行杂志、派职员出国学习、到国外购买时尚服饰样衣等各种途径,紧随国际时尚潮流,在整个20世纪上半期,一直保持与国外时尚的同步性。因此,红帮西服店、时装店是将国内服饰纳入国际时尚体系的重要中介,它们从国外引进最新服饰流行信息,再与中国人的审美特点相结合,设计出中国人乐于接受的国际新潮服装款式,从而成为国内服饰流行的发源地和风向标。当大众还未察觉到服装流行趋势时,红帮西服店就已参照国外流行款式设计出西服,展示在店铺的橱窗;大型红帮时装店不但静态展示时装,而且还在每个季节前期举行时装表演,展示流行款式,以扩大流行发布的影响力。在从众心理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人群被卷入流行的旋涡,成为紧随西方服饰潮流的追随者。

红帮西服店、时装店所采用的现代营销策略是推动近代服饰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红帮店铺以价位、地段分等级,分别为不同层次的消费人群服务,无论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还是工薪阶层的黎民百姓,都能在经济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穿上令人满意的西服。红帮店中的顾客无贵贱之分,大家闺秀、名妓名伶都是店中的座上客,“莫辨其为良为妓”,只要时尚、新潮,便成为众人模仿的对象。红帮西服店、时装店就是这样,通过现代营销策略尽量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群需求,他们之间又在相互效仿中,不断扩大新潮流服饰的影响力。在红帮店铺不断引领时尚新潮流又不断制造新需求的过程中,穿着西服的人数迅速递增,红帮西服店的数量也逐年增加,两者相互推动,加速中国传统服饰转型的步伐。

二、根据中国人的生理特点和心理需求,红帮裁缝改良西服缝制技术,并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服装款式,有力推动了中国传统服饰的转型

(一)创“海派”西服

最早从国外引进的西服,其造型特点与西方人的体形特点相符合,缝制工艺也为塑造西方人的体形特点而设计,而这种特点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人的体形特征。红帮裁缝针对中国人的体形特点对西服工艺进行改良,如外国人的肩头厚,中国人的肩稍薄,红帮西服工艺中的肩部“翘势”就相对较小,所形成的空间适宜容纳薄型肩。西服造型的特点还与一个民族的传统审美观相关,如英国人追求绅士风度,喜欢将西服做出燕尾服的特征,腰、胸紧窄而摆围较大,被称为英式西服;美国人崇尚自由,追求休闲、自在的风格,喜欢穿削肩、胸腰臀较大的宽松胖大西服,被称为美式西服;俄罗斯人常年居住在寒冷地区,形成了凝重、厚重、力量感的审美观,喜欢穿宽肩、挺胸的方箱状西服,被称为罗宋派西服。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在处事方式上讲求中和适度,恰到好处,在西服的选择上也以适度为准,既不喜欢过于紧身的英式西服,也不喜欢过于松垮的美式西服,而罗宋派西服又过于笨重。于是红帮裁缝针对中国人的“中庸”观,独创出与中国人体形适合度较高的西服,这种西服造型挺拔、肩薄、腰略宽松,在各个部位没有夸张的造型和突出的棱角,特别受到沪上人士的青睐,随被称为“海派”西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派”西服趋渐成熟。“海派”西服的成熟,加大了中国人对西服的接受度。

(二)创制中山装

服饰在转型期具有过渡性特点,与纯粹的西服相比,中西融合的服装款式更易被民众接受,更能达到广泛推广的效果。中山装便是红帮裁缝顺应时代需求、运用“中体西用”的原则而创造的服装款式。中山装吸收了西服结合人体自然造型的裁剪方法,呢料中山装的推、归、拔等工艺与西服工艺无异,明显区别于传统服饰的平面裁剪方式;而其外观款式设计却体现了东方的思维方式,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服

^① 上海档案馆藏《上海轩轳殿成衣公所历史沿革》,卷宗号 S248-1-2。

饰审美观。封闭的领部与掩饰袋口的袋盖体现了东方人含蓄、内敛的性格;上下左右4个方正的大贴袋在视觉上形成平稳、庄重的效果;前后垂直的门襟线、背缝线与古代深衣“规、矩、绳、权、衡”制度所形成的横平竖直的视觉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口袋和扣子还富有中国特色的寓意:4个口袋代表“礼、义、廉、耻”四维,是毋忘传统美德的象征;笔架形的袋盖代表革命知识分子,表示对文化人的倚重;门襟的5粒扣子象征五权宪法;袖口的3粒扣子则是三民主义的象征。

根据口述历史资料,第一件中山装就是由上海红帮名店“荣昌祥”设计、缝制完成的,“荣昌祥”后人王汝珍听父亲王宏卿讲述,^①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拿一件日本士官服来到“荣昌祥”,要求老板王才运将这件衣服改为具有中国传统服装特色的款式。此项业务的接待、款式的设计直到最后的缝制工作,都是由老板王才运和业务经理王宏卿主要参与完成的,他们将日本士官服原来的立领该为翻领,长方形袋盖改为笔架形,并加上4个立体贴袋,门襟扣子由7粒改为5粒,袖口扣子由5粒改为3粒。孙中山先生看到修改、缝制完成后的服装非常满意,由他带领穿着,而后逐渐风靡全国。

中山装的设计制作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特殊心态,一方面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要求一种与封建传统服饰截然不同的新服饰呈现于世,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情节与民族自尊,感情上又需要一种与西服有别,代表中国独立国格的服装,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西服虽好,不适应中国人民的生活,正式场合会见外宾有损国体,传统服式,形式陈旧,又与封建体制不易区别。”^②在1926年的《申报》有一篇有关《改良中国男子服装谈》的文章也提到,“国民的服装,需有一定的规定,现在洋服既易遭一部分人的反对,长衫又有种种弊端,惟有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学生装最妥了”。^③这里的学生装也是以中山装为母体创造出的一种服装款式。因此,在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由红帮裁缝设计、缝制的中山装,取西服立体裁剪缝制的原理,上下分体着装,在造型上表现人体曲线,舒适、卫生、便于动作、壮于观瞻,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体现了现代西方服饰的功能性特点;在款式设计上又取中国传统服饰之神韵,庄重、含蓄、寓意深刻,符合中国人传统服饰审美观,并形成了与西服完全不同的东方气质,易于被中国人接受。而且中山装的款式较易发展,以它为母体,红帮裁缝又设计了学生装、青年装、军便服等,可适应不同身份男性穿着;在面料选用和缝制方法上,中山装比西服的选择度更为广泛,它可以选用棉布采用简易的机缝制作,能够适应广大贫困地区农民的穿着需求。自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山装这种中西合璧的服装款式统领了中国男装半个多世纪,它不但成为中国男装的礼服,广大民众的便服,还影响了中国军队的军服,在中国近代服装史上影响深远。

红帮裁缝不但是中山装款式的最早设计者,而且还是这半个多世纪来制作中山装的主力军,国家元首穿着的中山装也出自红帮名师之手,如毛泽东穿的“毛式”中山装由红帮高手余元芳设计、缝制,周恩来穿的中山装由红帮高手楼景康缝制。可以说,在中山装统领中国男装的这段特殊的年代,红帮裁缝一直担任着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的穿衣重任。

(三) 改良旗袍

改良旗袍为中西合璧的女装款式典范。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的专利,汉族妇女一直保持着上衣下裙的服制。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于是满族妇女的旗袍也连同命服补子翎顶朝珠一起统统束之高阁,上衣下裙成了满汉妇女的共同装束。由于女人受到更多封建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与男装相比,女装在近代服饰的转型期,显示出更多的过渡性与不彻底性,从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服制案》中就可窥其一斑,“与男装中西服的盛行相反,西式女装的直接移植较少,《服制案》中的女式礼服仍是传统的上衣下裙。虽然上衣下裙的改进过程中也吸收了许多西方及日本女装的特点,但西式女装整体上却难成风气。”^④

①“荣昌祥”第二任老板王宏卿之子王汝珍所述,采访时间:2006年9月3日上午10点,采访地点:上海。

②《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

③《申报》,《改良中国男子服装谈》1926年12月16日。

④邱巍:《辛亥革命后“剪辫易服”潮》,《史林》,2000(2),第85页。

因此,若要具有更多传统思想的女性接受西方服饰,似乎以中西合璧的方式更为稳妥。虽然近代汉族女子最初穿着朴素、宽大的旗袍是“醉心于男女平权”,“蓄意要模仿男子”,^①但女子的“爱美的天性”好象在摆脱了封建专制的压抑后突然得到释放,在西方服饰的审美的影响下,她们开始对这种宽大的旗袍表示出不满的态度和改良的要求,在1926年的《申报》上就有一篇关于旗袍的谈论,“旗袍的式子,本是和男子的袍子仿佛,腰部和臀部并不分出宽窄,因此着旗袍的人并不能显出他天赋的形体美,所以应该将旗袍的腰部做的略微比臀部小些,方才觉得体态婀娜”。^②红帮时装店根据当时女子对旗袍的审美要求对其进行多次改良,据红帮时装名店“鸿翔”老板的后人金泰钧所述,“鸿翔”对旗袍的改良主要经过3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为轮廓线上的改变,如袖口逐渐缩小,腰身的外轮廓线略向内收;1925年左右,开始出现结构上的变化,如在腋下加胸省,使胸部呈现出立体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加腰省,并改变袖部结构,由中式连袖改为西式装袖,旗袍造型出现胸、腰差,袖窿处不再有多余的量,与身体的服帖度更大。^③经过从外形轮廓到内在结构的改良,红帮裁缝最终将中国这种传统的宽大袍服改为显示中国女子形体美与独特风韵的服装款式,衣服底下如“一缕诗魂”的女性终于在“旗袍的烘云托月中忠实地将其身体轮廓曲曲构出”。^④这曲曲构出的身体轮廓线如中国画上不经意的一笔,简洁明了却又韵味十足;立领、大襟、盘扣让人联想到说不尽的中国情节;两侧的高开衩在动与不动之间隐约显露肌肤,女子在“露”与“藏”的动感交错中体现了东方韵味的含蓄美,又显示出对西方服饰审美观的理解与表达。

总之,在中国近代传统服饰的转型过程中,红帮裁缝一直作为服饰新潮流的引领者,顺应时代潮流,在中西参半的思想主体下,实践着中西融合、“中体西用”的原则,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服装新款,使人们在新旧服饰的选择中尝试,在尝试中转变,在转变中形成习惯、自然,无形加速中国传统服饰转型的步伐,而且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红帮裁缝一直力图通过各种途径保持与国际时尚潮流的同步性,在中外服饰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On the Leading Role of Hong Band in the Costume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 Modern China

LIU Yun-hua

Abstract: Hong Band plays an important leading role in the costume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 modern China. They were the first to introduce the suit tailoring technology. They always keep pace with the western fashion trend and guide the new trend in domestic fashion. According to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demand of Chinese people, they have improved the suit tailoring technology, made overseas-styled suits, created a new style of costume combining eastern and western styles---Chinese tunic suit and improved cheongsam, which great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stume.

Key words: Hong Band tailors; modern Chinese costume; Chinese tunic suit; cheongsam

(责任编辑 竺小恩)

①张爱玲:《张爱玲文集》,《更衣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55页。

②《申报》,《女子新装谈》,1926年3月10日。

③“鸿祥时装公司”老板金仪翔之子金泰钧所述,采访时间:2006年12月13日上午9点,采访地点:上海。

④张爱玲:《张爱玲文集》,《更衣记》,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55页。